

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对外传播

欧阳奇

(中国人民大学 台港澳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邓小平不仅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创立者、践行者,而且是“一国两制”思想的宣传者、传播者。一直以来,学界对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及其贡献作了广泛深入研究,但鲜有文章系统论及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思想不失时机的重要传播。回顾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思想的亲力亲为传播,总结邓小平宣传“一国两制”理论的经验 and 智慧,对于全面理解邓小平在推动“一国两制”实践中的历史贡献,推动新时期国家大政方针、发展战略的对外传播,不无裨益。

关键词: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5)06-0019-07

“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邓小平这一伟大构想的历史功绩被研究者广泛关注,而他同时在促进这一理论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却很少被人提及。在香港因政改再度成为热点议题之际,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回顾邓小平对于“一国两制”思想的对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两制”的概念正式提出是在1984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思想开始酝酿,至90年代香港回归前夕,邓小平就这一构想做过持续的深入阐发,并且亲力亲为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外宣传。下面从重点对象、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三个方面,探讨邓小平对外传播“一国两制”思想的经验、智慧。

一、邓小平对外传播“一国两制”的重点对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事已高的邓小平将实

现祖国统一大业提上日程,高频度地会见多名中外各界人士,全方位地宣传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精神。他介绍和诠释“一国两制”的重点对象,主要有这样三种群体:

(一)利益攸关国度的政要及访华团

在历史上,英国和葡萄牙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了香港和澳门,自然这两个国家的政要是邓小平阐发“一国两制”构想的首要对象。英国方面的客人,邓小平先后接见了香港总督麦理浩、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前首相希思、首相撒切尔夫人、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等,诠释“一国两制”的理念。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就到访过中国的希思,多次听取了邓小平以“一国两制”为中心的谈话。葡萄牙方面,邓小平主要与其总理席尔瓦谈论了“一国两制”。

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反复强调美国是中国内政的粗暴干

收稿日期:2015-05-27

作者简介:欧阳奇(1982-)女,湖南平江人,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4JD710017)

涉者。正因为保持台湾孤悬海外对于美国,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美国成为邓小平阐述“一国两制”合理性的重要对象。自“一国两制”构想酝酿之初,邓小平先后向美国国会议员团、众议院访华团、前总统、前国防部长、美驻华大使、参议员代表团、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里根总统等声明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和立场。

邓小平也指出,台湾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关涉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显然,两岸能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实现统一,对亚洲的许多国家来说,也至关重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益的攸关者。因而,邓小平与来访的邻邦人士基本都论及这一重要话题,如日本的前首相、民社党访华团、公明党访华团、中日协会访华团,朝鲜金日成及其特使,缅甸领导人吴奈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菲律宾副总统,柬埔寨亲王等等。

(二) 来访大陆的港澳知名人士

随着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脚步越来越近,“一国两制”理论自然成为港澳同胞关注的核心议题。邓小平相当重视港澳本土人士在宣传这一理论中的独特作用,他向到访的香港同胞所表达的“同接触到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的期许,就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一考虑。得到邓小平亲自接见并听取“一国两制”方案的港澳同胞主要有:一是前来与会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如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一、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代表;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委员;1984年由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等,都获得了与邓小平畅谈“一国两制”的殊荣。二是赴大陆的工商界、文化教育领域、政界的知名人士。如香港的实业家查济民、包玉刚、李嘉诚以及唐翔千为首的工商界访京团等;文化教育领域的有作家查良镛、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政界的有赴京“请命”的非官守议员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澳门方面,邓小平主要接见了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等。三是参与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的代表。1986年、1987年、1990年,邓小平都向安子介、查济民等起草委员会中的香港委员谈及“一国两制”的重要性。

邓小平虽然对台湾问题也相当重视,甚至在

对台工作小组前特别冠上“专职”二字,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两岸官方未能实现真正接触,因此,也基本未能与直接从海峡对岸过来的台胞探讨这一构想。

(三) 以美籍学者为主的华人华侨

在邓小平看来,海外华人华侨在传播统一政策方面具有自身优势。如1974年,他在接见来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特别强调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并且强调:考虑到华人华侨对台湾人民的宣传工作,在各自的居住国开展起来相对便利,“回来以后反而不便利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安心留在居住国现在的工作岗位上”^{[1]383-384}。他多次接见了来访大陆的华人华侨,尤其以美籍的华人科学家居多。如当时任职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李耀滋、陈树柏、杨力宇、陈省身、丁肇中、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等知名教授,都相继获得当面聆听邓小平诠释“一国两制”原则和精神的机会。此外,他还亲切接见了与两岸三地往来密切的多名有居美经历的华人华侨。如先后工作于台湾、香港、美国的傅朝枢以及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先后居住在台湾、美国的陈鼓应和高丽文等人,都近距离地听取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适用于台湾的可行性介绍。

二、邓小平对外传播“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与海外、国际人士谈论“一国两制”时,主要对这一思想的提出依据、实施方式、重要意义作了权威阐发,使他们对于这一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最佳方式有了更为详尽的认知。

(一) 宣传“一国两制”的基本依据

“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对现实的充分考量。在“一国两制”提出之前,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统一将采取尊重现实的务实方案。如1979年,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都指出,要在尊重台湾现实的同时努力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在考虑到台湾现实和重视台胞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实现统一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同一年,他也指出:解决香港问题,“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2]478-500}。

“一国两制”的构想合乎和平共处的原则。如邓小平在1983年、1984年时,诠释的一个重点思

想即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统一方案“也是一种和平共处”^{[13]97}，这种和平统一不是大陆与台湾的相互“吃掉”，亦即不能拿社会主义去统一台湾，也不能用资本主义统一大陆，这种“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的办法就叫“和平共处”^{[4]917-941}。

“一国两制”的原则兼顾了多方的最大利益。邓小平以香港问题为例，强调所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考虑到了香港和中国以及英国的实际情况，“使三方面都能接受”，论及台湾问题时，也表示会兼顾到大陆、台湾及与台湾相关的外国资本三者利益；对于澳门问题，他更直白地指出，解决方式的立足点是同时符合中国和葡萄牙、澳门三者利益。他也总结道：“一国两制”才是“谁也不吃亏”、“谁都可以接受”的统一方略。^{[4]1019-1315}这实际上是对一国两制提出依据的详尽诠释。

（二）宣传“一国两制”的实施方式

强调“一个国家”与“两种制度”是一个整体。在实现统一、坚持一个国家的前提下，维持港澳台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邓小平宣传“一国两制”实施方式的重点内容。他在1978年和1979年的各种会见活动反复阐释了统一台湾的方式：社会制度不动，生活方式不变，收入不会减少，美日投资可以不动^{[2]465-430}。1981年后的几年中，邓小平就香港问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明：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各种制度不变，对外以“中国香港”名义发展民间关系^{[4]812}。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一国两制”是指在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港澳台地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而且特别重声这一统一方略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构建的，从而有力回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一度的喧嚣。^{[4]983-1178}他还多次提到，讲“一国两制”，就要讲全允许特殊地区搞几十年成百年的资本主义和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3]219}。

强调“中央直辖”与“高度自治”的统一。如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向宾客强调：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一国两制”对台湾“更宽一点，可以有军队”，并会对台湾人士在全国政治机构作妥善安排、“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但是，“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4]1000-766}。这就声明了保持台湾高度自治的同时，必须坚持中央之于行政特区的直辖权。他尤其以

国际广泛关注的香港问题为例，进一步论述了中央直辖的不可动摇性。他表示，在港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而且，“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后来，在指导基本法的制定时，他也一再提及“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4]978-1179}。至于香港的高度自治，邓小平解读为，是指北京不派人去管理，而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自己来管理，而是否赞同香港回归和祖国统一，或者说是否“爱整个中国，爱中国香港”则为爱国者与非爱国者的分水岭。^{[4]838-902}

强调“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变”始终是邓小平论述“一国两制”的关键词。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一再表示实现统一要保持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自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出台以后，他反复解释“五十年不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987年，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4]1178}。同时，他也强调：“不要笼统地说怕变”，问题是变什么，有的变是好事，如香港回归就是一种变，要变，一定是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有人担心变，所以基本法不能搞得太繁琐、太细致，否则不变都不可能。^{[4]998-1020}他补充说：不变是指两个方面不变，是指保持港澳台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同时，必须确保大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不变，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4]1178}。邓小平还提到：不变是考虑到香港的稳定，而香港的稳定，还需要稳定的政治制度，硬要照搬西方的一套会造成动乱，“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4]1236-1179}，普选并不一定有利，香港总督卫奕信说过的循序渐进方式比较实际^{[3]220}。这是邓小平对“变”与“不变”题中应有之义的精辟阐述。

（三）宣传“一国两制”的重要意义

1983年，当中英谈判接近尾声后，邓小平向国际国内访客主要从三方面宣传了“一国两制”的时代意义。

第一，它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思路。他多次明确阐述了这一理论的新颖性：“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这是一个新事物”；“史无前例”；“马克思没有说过，世界历史上没有过”^{[4]994-997}。

他也突出了这一理论的与众不同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一国两制”，这一构想不是由美日、欧洲或是苏联初创，而是由我们自己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事物”^{[3]218}。他解释说：为了解决台湾和香港的具体问题，中国才有了“一国两制”的办法。他因而骄傲地表示：“‘一国两制’别人提不出来”^{[4]1122}。

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邓小平谈及，一国两制“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然而，“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大胆地提出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符合并归功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以及实事求是精神^{[4]994-1018}。这实际上指出了这一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着一脉相承、丰富和发展的内在关系。

第三，它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成功范式。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在接见不同的对象中论及这一理论的国际意义达10次之多。如相关评述有：一国两制已被国际关注，能为某些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在国际上反应很好，为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范例”；“这种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3]60-87}；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行方案”；也为国际消除某些热点问题提供了“构想”和“经验”；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香港基本法具有“国际意义”^{[4]1009-1176}；等等。他在会见中也特别提到了“一国两制”体现的和平共处方式对于英阿马岛问题、直布罗陀问题、南沙群岛问题的启迪意义，还说到朝鲜北方提出的联邦方案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方针的体现^{[4]994-1009}。

三、邓小平对外传播“一国两制”的主要特征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深度解读和系统传播，对外诠释了这一伟大构想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增进了国内外人士对这一思想的了解和认同，推动了这一方略在港澳地区的成功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自信和魅力。邓小平对于“一国两制”思想传播和普及的影响，至巨而深远。回顾他对“一国两制”的对外传播轨迹，不难发现有如下显著特征：

（一）在传播中重视吸收合理建议，丰富“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

“一国两制”，不仅是马克思理论宝库中从未有过的伟大设想，而且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应运而生的理论体系。其突出的应用性，也使得这一理论一经酝酿，便广泛地向各界人士传达。如邓小平在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以前，反复向公众诠释的统一方式由和平共处替代了武力解放、统一模式由一种制度创新为两种制度，即体现出“一国两制”的基本理念。“一国两制”从最初构想，到理论框架具体化，再到正式写入相关法律的发展过程，也是其不断被宣传，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一国两制”的传播，不仅带有依据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特点，而且体现出重视民众反响，充分吸收合理建议的特征。

这一理论体系在传播中的充实和发展，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针对传播受众的相关反馈，凸显或重申了某些已有方针。另一种是根据传播对象的建议，提出或细化了相关政策。如1981年的“叶九条”就明确提到“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各种团体共商国是”，一贯重视海外同胞在统一大业中重要作用的邓小平，在有限的会见活动中更多的是呼吁国共两党对话，希望能与台湾当局对等谈判，期盼蒋经国等台湾领导人能顺应历史潮流。但是，得知某些台胞误以为大陆重视当局作用而相对忽略自己这一群体的真实想法后，邓小平先后四次重申了两岸谈判主要以当权的台湾当局为对手，同时非常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和作用的方针，并勉励“各界人士要在解决台湾问题方面出力”^{[4]949, 1189}。他重申的统一大业“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基本原则，即体现了第一种充实情形。再如，邓小平从酝酿“一国两制”之初，就一再申明要保持香港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不变，而且强调这种不变是“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策”。获悉香港本地同胞和外来投资者普遍担忧回归可能导致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被改变后，邓小平尤其注重宣传香港原有制度保持“五十年不变”的具体政策，并诠释说“人们担心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因而考虑设个年限，“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这种具体化能彰显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靠性，从而减少民众疑

虑^{[4]729,916}。他对“五十年不变”的详尽诠释,也体现了前一种情形。

而邓小平对提前培养管理人才必要性的多次阐述,即为第二种情形的充实。香港知名人士查济民曾向邓小平谈到:香港长期在英国人统治之下,香港人没有参政的机会,因而管理人才很成问题。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由此在中央政治扩大会议上提出:“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由香港爱国者为主体组成”,要立即着手培养能逐步参与香港管理的人才,要注重在香港政治性团体中造就一批政界人士。在会见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邓小平也谈到香港要考虑培养人才,香港的爱国者要考虑推荐和培养年轻人逐步参与香港的管理。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的会谈时,邓小平也论述了在过渡期让香港人参与管理的必要性。此后,他又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进一步强调各行各业要推荐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参与的唯一前提为爱祖国爱香港的真正爱国者。^{[4]805,1044}显然,邓小平采纳了查济民的合理建议,决策并宣传了如何培养香港管理者,并明确了香港的管理者应符合“政治上爱国”的起码要求。1984年,他谈及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时,再度表示:“港人治港有个前提,港人必须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一爱祖国,二爱香港”。这实际上为特区基本法的相关规定提供了重要指南。再如,邓小平在宣传“一国两制”的过程中,注意到香港本土有不少民众期盼能进一步细化基本法有关规定,以防止回归可能导致的政策大更替和起落,因此,邓小平数度耐心地说明了基本法不宜过于烦琐、法律规定不能过细致的基本原则,解释了法律若极度具体化,反因难以涵盖实践变化而容易生变的个中道理^{[4]1020,1113}。这实际上是立足于香港同胞的切身利益,明确了起草基本法的科学精神和方针。

从邓小平丰富充实“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两种情形可以看出,这一体系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形成和传播过程基本完全同步。而且,正是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反响和心声得以及时反馈,“一国两制”在实践运用中不断细化和深化。这一动态和开放性的过程,也彰显了“一国两制”充分尊重台湾和香港现实,最大程度地照顾同

胞利益和福祉的价值取向。

(二)通过同错误倾向的及时斗争,扫清“一国两制”传播的障碍

在宣传“一国两制”的过程中,邓小平与误读“一国两制”甚至企图阻挠“一国两制”贯彻的不良言行作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必要斗争,促进了“一国两制”理论的普及和实践。如针对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粗暴干涉和荒谬言论,邓小平一再声明了我们的统一立场和方针:“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美国不要做妨碍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事情”;美国在“九条建议”提出之后不应当给台湾提供保护伞或是出售武器,将台湾视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美国“实际上否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美国向来介入台湾问题,它在推动两岸对话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等等。^{[4]766,1064}邓小平还反复义正辞严地指出《与台湾关系法》投下了中美、台海关系的“阴影”,多次抗议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这些必要的斗争,声明了我国坚决捍卫主权的严正立场,也宣传了“一国两制”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合理方案。

针对台湾当局的某些错误趋向,邓小平也及时批判了其荒诞之处。他先后指出,和平统一的方案不是海峡两岸的任何一方吃掉另一方,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想法太不现实;“中国人有十亿在大陆这边”,因而某些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太不可能,太不现实,也太不谦虚”;无论中国的形象还是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都在大陆,与大陆争正统的做法显然“自不量力”;“一国两府”的提法实际上是“两个中国”的翻版,它回避了哪个才是中央政府的要害,等等。^{[4]917,1315}邓小平这些义正词严的驳斥,表明了只有“一国两制”才是既尊重历史又立足现实的科学的统一方案。

就“一国两制”在香港如何具体实施,邓小平针对英国的某些荒谬要求和香港极个别同胞的片面之见,作了旗帜鲜明的阐述。如在与英方交涉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重申:不提治权或是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香港的管理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谈判“没有‘三脚凳’,只有两

脚”；“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等等^{[4]838, 1307}。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驳斥了英方的无理要求和错误幻想，揭露了它在香港推行所谓“政治民主化”的险恶用心，坚持了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增进了本土同胞对“一国两制”顺利实施的信心。又如，在接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时，邓小平着重分析了香港个别同胞关于“一国两制”具体实施上的三种误解：一是目睹大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担心“一国两制”方针要发生变化的想法，实际上对中国基本政策实际上是两方面都“不变”缺乏全面了解；二是误以为中央对香港的事情完全放手，全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就“万事大吉”，实际上中央保持对特区的某些权力之于香港的管理“有利无害”；三是偏颇地认为香港采用“普选就一定有利”，实际上普选未必能推选出真正的爱国爱港者，即便普选的实行也应有“逐步过渡”的历程^{[3]217, 220}。邓小平对这些认识误区的及时剖析，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消除了香港同胞的某些疑虑，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实施进一步巩固了民众的思想基础和制度认同。他的相关阐释也表明，“剩余权力论”、“合理分割说”根本立不住脚。而他对“三权分立”错误看法的剖析，为香港基本法明确“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相互制约”的运行模式提供了理论前提，为行政长官的选举最终由提名委员会遵照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循序渐进原则奠定了民众认同基础。这些大政方针的明确，为东方之珠在回归祖国后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起到了体制上的保障作用。

（三）重视“意见领袖”传播“一国两制”的广泛影响

任何理论的真正大众化，都离不开“意见领域”在传播中的桥梁般影响。有传播学研究者指出：意见领袖在大众传媒和群体中的其他人之间充当着中介的功能，而且，大多数人正是通过与其所属群体中的意见领袖的人际交往，来获得更为丰富的信息和观点^{[5]33}。而且，“受众对传播者信任与否能够对观点改变产生影响”^{[6]25}。从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系统阐发和宣传来看，他实际上充分发挥了“意见领袖”的相关作用。他阐发和宣传这一理论的受众，基本都高度关注“一国两制”的

具体方针，又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某一领域较有声望的人物，还有着深入大众的优势。比如，较早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华侨杨力宇，归美后即写出了《邓小平对和平统一的最新构想》的重要篇章，这一作品很快获得多家报刊媒体的聚焦，从而在华人圈中形成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的普遍舆论^[7]，近距离听过邓小平谈话的香港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黄丽松，回港后产生并积极宣传了邓小平有关香港的方针确为回归大业“最好政策”的深刻认识^{[8]78}，著名小说家金庸与邓小平相见后，在《明报月刊》披露了相关谈话记录，并将“一国两制”高度评价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9]，等等。与邓小平探讨过“一国两制”的“意见领袖”，或通过转述邓小平的观点不自觉地促进了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或是通过长期的主动宣传而对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生了历史性影响。如香港当时的总督麦理浩到访大陆后，向香港及时传达了邓小平的回归构想不会损害在港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信息，从而有了次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10]477}，实业家包玉刚因其重要贡献而受到邓小平“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的高度赞誉^{[3]1332}；受邓小平委托向蒋经国传递信息的华侨李耀滋，提出了举办太平洋区华人合作讨论会以增进台湾和大陆交流的设想；得到邓小平亲自接见后的陈香梅，向海峡对岸传达了大陆高层欢迎台湾退役军人来探亲的最新考量，这对于增进两岸民众往来和交流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等等。由此可见，“意见领袖”一方面向邓小平传递了海外同胞对“一国两制”的关注和认知，另一方面又将这一理论的真实内涵由上至下、由内而外地向大众乃至全球作了准确传播，其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历史上不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而且就其如何具体实施作了权威诠释。在他阐述和宣传“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他结合海内外的反响，丰富和完善了“一国两制”构想，使其获取了全球华人华侨和其它国家的广泛认同，促进了这一创造性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施。可是，由于香港在历史上被外族长期殖民，再加上国际上某些反华敌对势

力的持续干涉和渗透,民众对“一国两制”思想的认同还有待深化,对国家的情感仍有待增进。近年来由是否需要实行“普选”而引发的政治争论甚至社会撕裂,足以表明对“一国两制”的阐发和传播的民心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今天,巩固香港同胞对“一国两制”的认同依旧是一项迫切的时代任务,而重温邓小平的重要论述和主要经验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香港民心的深度回归。港澳研究专家齐鹏飞指出:当务之急,是“回到历史发展的原点”,“回到‘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论述中,来追本溯源、正本清源,以廓清和指示未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路径”,因为“香港当前针对政改实施方案出现各种乱象,根本症结所在,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香港社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对香港基本法长期存在模糊、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认识”^[11]。而持续促进“一国两制”理论的深入传播,有利于民众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有助于“更多理解‘一国两制’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内在联系”,从而“增强投身‘一国两制’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12]。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5] [美]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6] [美]卡尔·霍夫兰.传播与劝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7] 罗炎卿.聆听“一国两制”构想的第一人:访祖籍江西宁冈的美籍教授杨力宇[J].党史文苑,1994(5).
- [8] 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9] 吴跃农.邓小平与金庸共议祖国统一[J].两岸关系,2014(8).
- [10]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 [11] 齐鹏飞.挺港迈向“双普选”中央立场坚定不移[N].文汇报,2014-08-20.
- [12] 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hm.people.com.cn/n/2014/1220/c42272-26244408.html,2014-12-20.

责任编辑 君 羊

Dissemination of the though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y Deng Xiaoping

OUYANG Qi

(Research Center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Deng Xiaoping is not only the founder and practitioner of the though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ut also the propagator and disseminator of it. The proposing and contribution of Deng Xiaoping’s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cademia has got an extensive and deeply research in academia circles, but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Deng Xiaoping that seizing every opportunity to personally spread the thought is rarely mentioned. Summarizing of the object,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ng Xiaoping’s dissemin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ought, and reviewing the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Deng Xiaoping’s disseminating the thought, which are benefit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to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in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the thought and promoting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new era.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xternal communication